

## 【语言文学艺术研究】

## 《宋元学案》文本史源及编纂方式考略

——以《安定学案》所录胡瑗传著为例

杜怡然

(北京大学 中文系, 北京 100871)

**摘要:**《宋元学案》作为宋元学术思想史的重要文献,其编纂过程与文本结构反映出学术史书写的复杂性。目前学界研究主要围绕版本源流展开,较少关注内容来源与层次。以《安定学案》所录胡瑗传著为例,案主小传以正史为基础构建框架,但间接史源削弱其真实性;论著选录侧重编纂者推崇的典型观点,兼顾学术提炼与主观诠释;附录则突破史传局限,广泛采摭人物评价,形成多维叙事。对于学案体发展中的层累式编纂,需注意辨析不同文本层次中原始材料与后设阐释的关系,以最大限度还原宋元学术思想史的真实面貌。

**关键词:**《宋元学案》;《安定学案》;胡瑗;史源;编纂方式

**中图分类号:** G 256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3486/j.issn.2097-4973.2025.03.016

《宋元学案》由黄宗羲初创,历经黄百家、全祖望等人百余年修补整饬,以百卷本面貌流传于今。全书共87个学案、2个学略和2个党案,记述2000余名宋元学者思想与生平。各学案内容包括序录、传记、论著、附录及承传弟子情况五部分,系联宋元两代学者学派及师承谱系<sup>①</sup>。由于书成众手,内容几经分合,诸版本面貌不甚相同,学界对其成书过程和版本区别已有不少探讨<sup>[1-2]</sup>。黄宗羲编此书时,距宋元时代已远,所见资料或非原貌,不免有疏漏甚至错讹之处。加之编纂者个人思想倾向影响,对资料去取并非完全客观,所以《宋元学案》所反映的宋元两代学术思想史,不能等同于真实的历史。以卷一《安定学案》为例,其主要介绍胡瑗及其弟子情况,基本保

留了黄氏父子编纂原貌,间有黄百家、冯云濠和王梓材案语,附录部分有少数条目调整和补充。

## 一、案主小传

### (一)来源与特点

胡瑗小传简述其姓名、籍贯、少年事迹、仕宦经历、著述与后人评价等内容,其资料主要取材于《宋史·胡瑗传》、《周易口义》卷首《行实》<sup>②</sup>、《阙里志》(明代陈镐撰,孔胤植重纂,明崇祯年间刻印、清雍正年间曾增修。今日本内阁文库藏明崇祯刻本中有“甫七岁善属文,年十三通五经,以贤圣自期待。邻父见而异之,与其父言曰,后当为国家伟器。往泰山,与孙明复石守道三人同读书,十年不归”之语,与《安定学案》文字基本一

<sup>①</sup> 现黄氏父子原稿本已佚,可见版本主要有余姚梨洲文献馆藏黄璋校补本二十册、国家图书馆藏清道光十八年(1838)冯氏醉经阁本一百卷、清道光二十六年道州何绍基刻本一百卷及据此翻刻的长沙龙汝霖本。此外,现代整理本有1987年北京中华书局据长沙龙汝霖本标点本,1994年初版、2005年增订重印的浙江古籍出版社据《四部备要》本标点整理的《黄宗羲全集》本。本文所录《宋元学案》文字,以何绍基刻本为底本,参考黄璋校补本、醉经阁本及现代整理本。

<sup>②</sup> 本文所录《周易口义》文字内容依据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李振裕白石山房刻本,参考他本。

收稿日期:2025-03-15

作者简介:杜怡然(2000—),女,山东惠民人,在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古典文献学与宋明史学文献研究。

E-mail:duyiran123456@126.com

致,而其他文献皆不载。)欧阳修所作《胡安定先生墓表》及蔡襄所作《太常博士致仕胡君墓志》,且绝大部分内容由诸书拼合而成。其中,《宋史》本传与其他资料中部分内容表述相似,如:

虽盛暑,必公服坐堂上,严师弟子之礼。视诸生如子弟,诸生亦爱敬如父兄。其教人之法,科条纤悉具备。(《宋元学案》)

瑗教人有法,科条纤悉具备,以身先之。虽盛暑,必公服坐堂上,严师弟子之礼。视诸生如其子弟,诸生亦信爱如其父兄。(《宋史》)

后为苏湖二州教授,严条约以身先之。虽大暑,必公服终日,以见诸生,严师弟子之礼。(《周易口义》)

再如:

是时礼部所得士,先生弟子十常居四五,随材高下而修饰之,人遇之,虽不识,皆知为先生弟子也。(《宋元学案》)

礼部贡举,岁所得士,先生弟子十常居四五。其高第者知名当时,或取甲科,居显仕,其余散在四方。随其人贤愚,皆循循雅饬,其言谈举止,遇之,不问可知为先生弟子。(《胡安定先生墓表》)

礼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居四五,随材高下,喜自修饬,衣服容止,往往相类。人遇之,虽不识,皆知其瑗弟子也。(《宋史》)

士出其门者,凡数千,礼部岁所得士,翼之弟子十常居四五。(《阙里志》)

以上两处,分别记述胡瑗恪守礼仪规范和弟子才能杰出之情形。宋代以降,诸书内容辗转因袭,大致相似,但从文字比较来看,《宋元学案》在重复处多依照《宋史》本传摘录。

就具体内容而言,《宋元学案》在整合资料上表现出了鲜明的叙述特点。首先,以时间为序,先记述胡瑗从幼年至去世的生前经历,再补充以其去世后弟子刘彝的评价。正面记叙和侧面议论相结合,更全面地表现其人的形象和地位。在结尾处,黄百家还继续补充程颐与胡瑗的交往和评价,在众多资料中选择重要人物,通过其敬重和赞扬凸显胡瑗为人醇厚、弟子贤能的形象。其次,在补充整合资料时,将履历与具体事迹相结合,分别拼合胡瑗在某地的任职、举措和结果,使

叙述更加完整连贯。例如,记载其在湖州教学事迹时,先摘录《行实》的任职缘起,再摘录《宋史》描写在湖州教学时恪守礼仪规范的情形,再引录其“经义”、“治事”二斋的设置。最后,侧重其在儒学教育上的贡献,省略制礼作乐等具体细节,强调胡瑗在宋元学术史传承中的作用。

## (二) 纠谬与补充

在摘录过程中,对于资料中的错讹谬误,《宋元学案》编纂时有意识地进行纠正。例如,小传有言“滕宗谅知湖州,聘为教授”。此句出自《周易口义》卷首《行实》,曰:“乾道间,滕宗谅知湖州,建湖州学,以礼币聘延为师。”乾道为南宋孝宗年号,显然与胡瑗生卒不合,属于《行实》误记。滕宗谅知湖州,事在北宋仁宗宝元年间,其上表申请建立湖州州学,并请胡瑗任教。《輿地纪胜存》载:“宝元二年(1039),知州滕宗谅请建学,延安胡翼之主学,四方之士云集受业。”<sup>[3]6a</sup>因此,《宋元学案》在叙述此事时,将“乾道间”这一错误时间删去不录。

另如,小传言胡瑗“凡教授二十余年”。此句同样出自《行实》部分,原句为“先生自庆历中教授苏湖二十余年,景仰弟子前后以千数计。”庆历年间为1041—1048年,然而胡瑗于仁宗嘉祐四年(1059)去世,不可能教授“二十余年”。实际上,胡瑗在苏湖地区进行教学活动,始于范仲淹聘请他担任苏州郡学教授。《范文正公年谱》记载:“(景祐)二年(1035)乙亥,年四十七岁,是年公在苏州奏请立郡学。”<sup>[4]24b-25a</sup>同时,《苏州学记》载:“于是召安定先生首当师席。”<sup>[5]6a</sup>从景祐二年(1035)至嘉祐四年(1059)去世,言其教授二十余年才是合理的。因此,《宋元学案》在编纂时把“自庆历中”这一错误时间也删去了。不过,这样的删改并非完全准确,《行实》此句还有一处错误,即“教授二十余年”是总时长,而非在苏湖地区教学的时长,胡瑗后来是在太学任教,《宋史》言“皇祐中,更铸太常钟磬,驿召瑗、逸,与近臣、太常官议于秘阁,遂典作乐事。……岁余,授光禄寺丞、国子监直讲。乐成,迁大理寺丞,赐绯衣银鱼。瑗既居太学,其徒益众,太学至不能容,取旁官舍处之。……嘉祐初,擢太子中允、天章阁侍讲,仍治太学”。因此,《宋元学案》在其教授苏湖的事迹之后摘录此句,说明并未准确核实其生

平,造成著录之讹。

由于年代久远,黄宗羲等人可接触的一手史料有限,《宋元学案》的编纂因而略显杂糅拼凑、捉襟见肘。部分内容本就缺少佐证,引用此类材料后,导致《宋元学案》自身内容准确性有所下降,在当今相关研究中尤其应注意辨别。如小传提到,胡瑗少时曾前往泰山读书,与孙复、石介同学。此三人被誉为“宋初三先生”,同学之事传为一段佳话,但此事的真实性却值得怀疑。最早记载见于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侍讲布衣时,与孙明复、石守道同读书泰山。攻苦食淡,终夜不寝,一坐十年不归。得家问,见上有平安二字,即投之涧中,不复展读。”文字与《行实》、《宋元学案》等基本相同,注为曾孙洙所记。但此事其他文献皆不载,又根据三者生平仕履,无同时在泰山之可能<sup>[6]</sup>。故此属后人杜撰,根据三人经历强行附会,《宋元学案》失之考察而摘录。

为了行文连贯通畅,《宋元学案》在摘录资料原文之外还进行了少量补充。有实义的内容如“范文正爱而敬之,聘为苏州教授,诸子从学焉”,串联胡瑗生平经历;再如“所著有《易》、《书》、《中庸义》、《景祐乐议》”,总结胡瑗著述。整体来看,基本是拼合前代之书而成。

虽然大部分照录他书,但在个别字句上仍可以看出编纂者的思想倾向。如刘彝与宋神宗的问答之语,早期文献均作:

熙宁二年召对,上问曰:“胡瑗文章与王安石孰优?”彝对曰:“臣师胡瑗以道德仁义教东南诸生时,王安石方在场屋中修进士业。臣闻圣人之道,有体、有用、有文……臣师当宝元、明道之间,尤病其失,遂明体用之学以授诸生。夙夜勤瘁,二十余年,专切学校。始自苏、湖,终于太学,出其门者,无虑数千余人。故今学者明夫圣人体用,以为政教之本者,臣师之功也。”上曰:“其门人今在朝者为谁?”对曰:“若钱藻之渊笃,孙觉之纯明,范纯仁之直温,钱公辅之简谅,皆陛下所知也。其在外,明体适用之学,教于四方之

民者,殆数十辈。其余政事、文学粗出于人者,不可胜数。此天下四方之所共知,而叹美之不足者也。”上悦。<sup>①</sup>

而《宋元学案》有三处明显的调整。第一,去掉“文章”二字,作“胡瑗与王安石孰优”,将评价范围由文章扩展至整个人物。第二,在“臣师之功”后加上“非安石比也”一句,更突出胡瑗功绩之高。第三,去掉“而叹美之不足者也”一句,此句原本为褒扬义,指胡瑗门人数量多且优秀,但在天下人眼中仍不够多,文意稍显纡曲。《宋元学案》编纂时,极有可能将此句理解为美中不足的批评义,故而删去。总而言之,编纂者有意识抬高后人对胡瑗的评价,体现出其对胡瑗学术和为人的高度认可与称颂。

整体来看,小传部分采录案主在《宋史》本传、著述序跋、墓表墓志、地方志中的相关资料拼合整理而成,其中尤以《宋史》本传为主,并对资料有所纠谬与补充。传记内容叙述丰富翔实,重视案主在教育 and 学术史中的地位,综合评价其成就与影响,同时体现出编纂者本人的学术倾向。不过,受到资料与认识的局限,部分内容史实失考,不可全然信从。

## 二、案主论著

### (一)史源判断

第二部分,胡瑗相关论著著录有《论语说》8条、《春秋说》7条。所谓“《论语说》”一书,历代书志皆不载。经文字比较,应均摘录自黄震《黄氏日抄》卷四十五“读诸儒书”十二,原题即为《论语说》<sup>②</sup>,数量、顺序与标目皆同。黄震书中与之并列的,还有题为《石徂徕文集》、《贤惠录》、《孝行录》等书的读书札记。但其他文献均无所谓《论语说》之内容,不知此8条原出何处,是否为胡瑗本人所撰。稍有出入的是,第1条《黄氏日抄》诸版本均作“辅人之仁”,《宋元学案》各本却作“辅仁之任”。

<sup>①</sup> 出自《周易口义》卷首《行实》。《五朝名臣言行录》其他书籍及各版本皆相似,唯《宋元学案》下述不同,当为《宋元学案》编纂时修改。

<sup>②</sup> 《黄氏日抄》文字内容依据元至元三年刻本《黄氏日抄》,参考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等。

胡瑗所作《春秋》学论著,有《春秋口义》五卷<sup>①</sup>、《春秋要义》三十卷<sup>[7]1472</sup>及《春秋辨要》<sup>②</sup>,但明以后皆亡佚。文献中没有所谓《春秋说》一书的记载。《宋元学案》此7条内容,第2、3、4、5条录自《黄氏日抄》卷七“读《春秋》一”和卷八“读《春秋》二”;与第1、6、7条文字相似的文献较多,如《春秋胡传纂疏》、《春秋阙疑》、《春秋辑传》等,但仅《春秋胡传纂疏》包含全部3条,自此书摘录的可能性较大<sup>③</sup>。同时,编纂者仿照《论语说》之名,总其名为《春秋说》,仍按原书次序,以《春秋》经文时间为序编排。

上述诸条目,基本照录原书,不加删改,唯《春秋说》第1条针对桓公五年蔡人、卫人、陈人从王伐郑一事,文字稍有出入:

安定胡氏曰:不书“王师败绩于郑”,王者无敌于天下,书“战”则王者可敌,书“败”则诸侯得御,故言“伐”而不言“败”。茅戎书“败”者,夷狄非有礼义,王者不畜也。王师非王亲兵致讨,故败而书之。(元至正八年日新堂本《春秋胡传纂疏》,明万历芝城建邑书林余氏刻《五经大全》本《春秋大全》等与此同)

安定胡氏曰:不书“王师败绩于郑”,王者无敌于天下,书“战”则王者可敌,书“败”则诸侯得御,故言“伐”而不言“败”。茅戎书“败”者,既非声教所及,王者不讨也。王师非王亲兵致讨,故败而书之。(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春秋胡传附录纂疏》<sup>④</sup>)

不书“王师败绩于郑”,王者无敌于天下,书“战”则王者可敌,书“败”则诸侯得御,故言“伐”而不言“败”。茅戎书“败”者,王师非王亲兵致讨取败,而书之。((《宋元学案》,黄璋校补本、醉经阁本、何绍基本等文字均同)

《四库全书》本《春秋胡传附录纂疏》为避讳“夷狄”字眼,将划线句做了修改。而检视诸书,

却未有如《宋元学案》这般全句删除者。黄氏父子编纂《宋元学案》时,《四库全书》尚未编修。如果说是为避免敏感字词而删,但《宋元学案》中大量使用“夷狄”等词,其他处皆无删改;这种做法也不符合黄宗羲的遗民心志。因此,这句话应当不是《宋元学案》编纂时删去的,极有可能是《宋元学案》抄录的底本经清中期严厉的文化环境,已然无此语句,故而被《宋元学案》所延续。可见《宋元学案》虽成书年代较早,但选录的底本仍有时代局限,非早期原貌,其他字句也应注意甄别。

## (二)资料选取倾向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胡瑗的论著,编纂者仅从《黄氏日抄》等两书中摘录有关《论语》和《春秋》的少量内容,其他经学论述皆不录。且《黄氏日抄》卷七至卷十都是“读《春秋》”札记,明确标注为胡瑗论说的共20余条,《宋元学案》却只录4条。因此,有必要结合条目内容详细分析。

从选取的资料出处来看,编纂者尤其偏重《黄氏日抄》。胡瑗一生的著述较多,涉及经学、音乐、武学、教育等多个方面,然而到清中期,可见到的已十分稀少,《四库全书》收录的只有《周易口义》、《洪范口义》及与阮逸合著的《皇祐新乐图记》三部,流传情况可见一斑。《宋元学案》一书性质导致其主要载录案主经学类著述。故《皇祐新乐图记》此种音乐类合著,理当不予收录。在其经学著作中,当时黄氏父子可见完秩的仅《周易口义》与《洪范口义》。另外散见于各书中的条目有如《黄氏日抄》中的《论语》和《春秋》多条,元郑玉《春秋阙疑》、元程端学《春秋本义》及《春秋或问》,以及宋杜濬《春秋会义》、元汪克宽《春秋胡传纂疏》等中的《春秋》条目。由此看来,自《黄氏日抄》与《春秋胡传纂疏》中辑佚,不失为合理之举。

此外,黄宗羲对待黄震的态度历来非同一般。关于二人关系,主要有两种说法:南宋孝宗

① 《直斋书录解題》卷三、《文献通考》卷一八三均著录为五卷,《通志·艺文略》卷六三著录为二十卷。

② 朱彝尊《经义考》卷一八〇著录朱临《春秋统例》引《金华志》云:“临先家吴兴,五季避乱,迁浦阳,从安定胡瑗受《春秋》。瑗著《春秋辨要》,谓惟临所得为精。”

③ 《春秋胡传纂疏》文字内容依据元至正八年建安刘叔简日新堂刻本,参考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春秋胡传附录纂疏》等。

④ 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抄内府藏本《春秋大全》作“既非声教所及,王者不治也”,余皆同。

时期,其远祖黄槻任庆元通判,有三子:万一、万二、万三。金兵攻陷庆元城,三子在逃亡中失散。故一说认为,黄万一即黄震先祖。如万斯大《梨洲先生世谱》云:“姚江黄氏,汉颍川之后。靖康之乱,迁于婺源。有仕为庆元通判者,金人破庆元,不屈死之。子三人,分地避兵;一居定海(东发之始祖),一居慈溪吴岙,一居凤凰山竹墩。”东发,即黄震之字。《竹桥黄氏宗谱》同持此说。万斯大进一步指出,“居竹墩者,讳万河,字时通,号鹤山。居三十年,又徙余姚之竹桥,则梨洲先生之始祖也”,认为黄万河(即黄万二)是黄宗羲之祖。另一说认为,黄震是黄万三之后。黄百家在《黄氏续录·儒林》中言:“(黄震)始祖为万三府郡。”不论何种说法,黄震均属黄宗羲族祖。且黄宗羲在著述中言及黄震时,屡屡称“祖”,言语恭敬。他曾为自己的书斋题名为“续钞堂”,是为了“思承东发之绪”<sup>[8]3</sup>。黄震作为南宋遗民,坚守不仕,隐馁而死,也正与黄宗羲“不为异姓之臣兮,肯为异姓之子”的气节相合。因此,便可解释为何主要引录《黄氏日抄》内容。

《黄氏日抄》、《论语说》条目全录,然《春秋说》却仅取4条,又与他书内容拼合,其背后暗藏编纂者之意旨。第1条论书“伐”而不书“败”之义例,彰显王师的正义性质;第2条论书“归”字义例,表达对蔡季品行和地位的认可;第3条论书“王人子突之救”原因,是为体现遵循王法;第4条斥责臣子不讨伐弑君之人,未能尽职。以上4条,分别以君主和臣子为主体,突出“尊王”的统一主题。而第5条论庄公亲事有违礼制;第6条称赞伯姬恪守礼仪;第7条论书“子”之义例,符合太子身份。以上3条,分别从君臣、夫妇、父子三方面论述遵守礼制的正反案例。故而上述7条内容虽少,却有代表性地体现了胡瑗尊王明礼的思想主张。

作为宋代儒学的开创性人物之一,胡瑗的思想影响不可谓不深远。其论述以经文为主,舍弃传注成见,发一时议论之先。而黄震同样“以经为正”,批判地采纳《三传》解释。至黄宗羲时,更能反思驳正前人不足,兼蓄《三传》而融为一家之学。并且,胡瑗时值唐末五代士风颓丧之际,希望重新确立儒家传统价值观念,以达到经世济民的效果。而黄震主张躬行实践之学,强调《春秋》

学中“内中国、外夷狄”的大义。这同样与黄宗羲所处环境相符合,明末学风空疏,他厌恶众人“天崩地解,落然无与吾事”<sup>[9]16</sup>的态度,力主学问与事功合一,解救国家之急难。在这种意义上,由宋至清几百年的政治与学术变迁被串联起来,不断淘洗出新的价值。而胡瑗、黄震与黄宗羲三人的《春秋》学思想,也经由《宋元学案》一书的摘录,产生着呼应与回响。

### 三、案主附录

附录部分,黄氏父子初录有10条,未有黄百家案语。后王梓材将“番禺大商子”一条移后,作为安定门人单独立传,又新增补入6条。此变化发生在道光二十六年(1846)何绍基重刻本编纂时,王梓材重校补入,醉经阁本尚无。附录主要摘录多部文献中关于胡瑗本人籍贯、讲学、治家、论著等各方面事迹逸闻,作为对其人形象的丰富与补充。文字内容在多部前代文献中有相似表述,厘清资料来源。试举二例如下:

先生世居安定,流寓陵州。父讷为宁海节度推官,随任生于泰州宁海乡,先生故址也。人称之为安定先生,溯其源也。(《宋元学案》)

先生世居安定,流寓陵州,父讷为宁海节度,随任生于泰州宁海乡,先生故址也。人称之为安定先生,溯其原也。(《周易口义》卷首)

先生在太学,其初人未信服。使其徒之已仕者盛侨、顾临辈分置执事,又令孙觉说《孟子》,中都士人稍稍从游。日升堂讲《易》,音韵高朗,旨意明白,众皆大服。五经异论,弟子记之,目为《胡氏口义》。(《宋元学案》)

其初,人未甚信服。使其徒之已仕者盛侨、顾临辈分置执事,又令孙觉说《孟子》,中都士人稍稍从游。日升堂讲《易》,音韵高朗,旨意明白,众皆大服。……五经异论,弟子记之,目为《口义》。(《周易口义》卷首)

……其初人未甚信服,乃使其徒之已仕者盛晦之侨、顾子敦临、吴元长孜辈分治执事,又令孙莘老觉说《孟子》,中都士人稍从之游。一日升堂讲《易》,音韵高朗,旨意

明白,众方大服。(《吕氏家塾记》,《五朝名臣言行录》淳熙本。)<sup>①</sup>

……五经异论,弟子记之,目为《胡氏口义》。(《五朝名臣言行录》淳熙本)

……五经异论,弟子记之,目为《胡氏口义》。(蔡端明撰《墓志》,《五朝名臣言行录》李衡校正本。)<sup>②</sup>

经比较可见,以上2条《周易口义》卷首《行实》、《题赞》的文字内容与《宋元学案》最为接近。第3—7条情况亦相同,此7条在二书中排列顺序也均一致。而《五朝名臣言行录》的两个主要版本,均不能完全覆盖上述条目。小传中部分内容也是如此:虽《行实》与《言行录》都有类似内容,但经仔细比较,《言行录》不尽如《周易口义》周详,且有相当一部分字词表述存在差异。而其他文献更无数量和文字更近似者。故此本《周易口义》刊行虽晚,但恰好在黄宗羲等人编纂《宋元学案》之前,极有可能被当作编纂资料加以充分利用。

不过,第8条治家之语为《周易口义》所无,而在《言行录》中有载;且《宋元学案》写明是胡瑗孙涤所言,因此黄宗羲等有可能也检阅了《言行录》内容,而又在附录中补充了不同的条目。另外,末尾黄百家案曰:“其云先生在太学,与明复避不相见,此《邵氏后录》之谬,正与‘主痈疽、寺人’之谈同也。”今三十卷本《邵氏闻见后录》中,均无相关内容。而《五朝名臣言行录》卷十载:“先生恶胡瑗之为人,在太学常相避,瑗治经不如先生,而教养过之。”并在最后注明出于“《邵氏后录》”。此为黄宗羲等编纂《宋元学案》时摘录《言行录》又添一重证据。

除以上条目外,最后一条明引黄震之语,与论著部分的大量内容一样,同样出自《黄氏日抄》,足见对黄震之说的重视。

而王梓材所补入的6条,分别摘录自吕本中《童蒙训》、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薛季宣《浪语集》和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主要围绕胡瑗著作特点加以摘编。如:

晁公武曰:安定《易解》甚详,盖门人倪天隐所纂,故序首称“先生曰”。(《宋元学案》)

此解甚详,盖门人倪天隐所纂,非其自著,故序首称“先生曰”。(衢本《郡斋读书志》)

此解甚详,盖门人倪天隐所纂,非其自著也,无系辞。(袁本《郡斋读书志》)

晁公武曰:安定《易解》甚详,或云门人倪天隐所纂,非其自著也,无系辞。(《经义考》)

虽此句不唯出现在《郡斋读书志》一书中,但《经义考》各版本末句均作“非其自著也,无系辞”,与《宋元学案》不合。袁州本《郡斋读书志》也是如此。嘉庆年间,汪士钟重刻衢本《郡斋读书志》,正为道光年间王梓材修补《宋元学案》提供了基础。

从内容上,附录对胡瑗称谓、教学、治家、著述思想和后世评价等方面作了补充,是小传内容的丰富与扩展。末尾的黄百家案语,纠正邵博著录之谬。全案从正反两种评价突出胡瑗为人亲善的良好形象,通过综合性的描述,展现出一代大儒学识渊博、意趣高洁、教学有法、桃李天下、严厉勤奋、待人友善的特点。

从《安定学案》所录胡瑗传著中可见,《宋元学案》案主小传以采录正史为主,相对完整和系统,然而史料的二手性导致真实性受限。同时,编纂者又进行二次加工,突出教育与学术史评价。在阅读与研究中,应注意厘清不同文本层次,逐一分析。案主论著部分在当时可见文献基础上,从编纂者推崇的文本中搜集选取观点鲜明、有代表性的内容,使得此部分既是案主学术的高度凝练与归纳,又体现出编纂者的主观认识和总结。附录部分接续小传史源和内容,对案主生平进行扩展补充。资料选取更加广泛,注重相关人物评价,侧重丰富性而非真实性,在学案史体例发展中起到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sup>①</sup> 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主要有两个版本系统,一是与《三朝名臣言行录》合为一书而单行的南宋淳熙刻本,也是目前所见最早的版本,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曾著录。《四部丛刊》(初编)据此收录。

<sup>②</sup> 《五朝名臣言行录》第二个系统是署名晦庵先生朱熹纂集、太平老圃李衡校正的南宋宝祐六年(1258年)刻本。此本内容删削较多,但流传较广,故载录以作比较。

综上,以《安定学案》为例,可以窥见《宋元学案》的材料选取与编纂方式,反映出编纂者对案主的主观认知与评价。希望本文的考察,能够对

《宋元学案》一书文献价值与思想价值的认识有所推进。

#### 参考文献:

- [1]金晓刚. 编纂与刊刻:《宋元学案》文本生成史研究[M].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21.  
 [2]吴光.《宋元学案》成书经过、编纂人员与版本存佚考[J]. 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7-16.  
 [3]王象之. 輿地纪胜存[M]. 刻本. 岑建功,惧盈斋,1849(清道光二十九年).  
 [4]楼钥. 范文正公年谱[M]. 刻本. 叶士美,欧阳席,1517(明正德十二年).  
 [5]朱长文. 朱先生余稿[M]. 刻本. 1712(清康熙五十一年).  
 [6]严杰.《名臣言行录》所记胡瑗与孙复、石介同读书泰山事质疑[J]. 古典文献研究,2003(1):199-203.  
 [7]郑樵. 通志[M]. 北京:中华书局,1995.  
 [8]全祖望. 梨洲先生神道碑文[M]//黄宗羲. 黄宗羲全集.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  
 [9]黄宗羲. 南雷文案[M]. 影印清康熙刻本. 上海:涵芬楼,1922(民国十一年).

## A brief study on the textual sources and compilation thoughts of *Song Yuan Xue An*

—A case study of Hu Yuan's biography in *Anding Xue An*

DU Yira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document in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the compilation process and text structure of *Song Yuan Xue An* reflect the complexity of writing academic history. Currently, academic research mainly focuses on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different editions, with less attention paid to the sources and levels of the content. Taking the biography of Hu Yuan recorded in *Anding Xue An* as an example, the author's biography builds a framework based on the official histories, but the indirect historical sources weaken its authenticity. The selected works focus on the typical views advocated by the compilers, taking into account both academic refinement and subjective interpretation. The appendix breaks through the limitations of historical biographies, and forms a multi-dimensional narrative by widely collecting evaluations of the figures. Regarding the accumulative compil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cademy-case style, it is necessary to carefully distinguis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riginal materials and the subsequent interpretations in different text levels so as to restore the true face of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to the greatest extent.

**Keywords:** *Song Yuan Xue An*; *Anding Xue An*; Hu Yuan; historical sources; compilation method

(责任编辑:许 金)

引用格式 杜怡然.《宋元学案》文本史源及编纂思想考略:以《安定学案》所录胡瑗传著为例[J]. 山东航空学院学报,2025,42(3):118-124.

DU Y R. A brief study on the textual sources and compilation thoughts of *Song Yuan Xue an*: A case study of Hu Yuan's biography in *Anding Xue an*[J]. Journ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2025,42(3): 118-124.